

试析初唐楷书的发展及其时代背景

梁 玮

(天水市博物馆,甘肃 天水 741000)

[摘要]初唐楷书在隋代融合南北朝书法的时代背景下逐渐走向成熟,形成了以“初唐四家”即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、薛稷为代表的初唐楷书风格,为世人树立了楷书“法”的典范,为唐代楷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推动了楷书在唐代走向鼎盛时期。

[关键词]书法艺术;唐代楷书;“初唐四家”

[中图分类号]J292.24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12)16-0101-02

南北朝时期,以长江为界,中国处于分裂状态。在南北朝对峙的169年间,我国的书法史亦分为两派:南派沿袭东晋二王的典范,擅长帖学,一些士大夫与帝王贵胄都雅好书法,相与赏玩评鉴,从而形成了一种浓郁的艺术氛围。遗憾的是,年代久远,留下来的真迹寥寥无几。相反,北朝特别是北魏刻碑之风盛行,大量的碑刻墓志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,这些作品风貌各异,不但显示出楷书演变的痕迹,同时正因为其不成熟反倒流露出不同的意趣和风貌。

隋朝在我国楷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,所谓“熔南北于一炉,开唐书之先声”。隋代是南北朝书法的交汇融合与发展时期,也是唐代楷书的奠基时期,这个时期的书风从总体上来看是实现着从拙朴向精美、从荒率向规整的转换,标志着书法艺术的日趋成熟;同时,也正是由于转换的不确定性,导致了隋代书法有着较大程度的自由和选择空间。从流传的隋碑如《龙藏寺碑》、《董美人墓志》、《启法寺碑》、《苏孝慈墓志》等来看,楷书已相当成熟,初唐书家莫不受其影响。

楷书自隶书蜕化而来,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断演变,至隋朝已渐趋成熟,其标志为:一是逐步摒弃了富有隶意的波挑,而采用了楷书回锋收笔的方法;二是形体由略扁转为方正;三是字形变得整齐妍美起来。隋朝书法上承汉魏六朝之余绪,下开唐人楷法之先河,从其流传的碑刻来看,隋人对方笔的运用已相当成熟,对结字的匀称、平和、严谨已趋于完美。六朝时期,隶楷错变,无体不有,面目各异,其体质拙朴,意态奇变的现象至唐代已达到完美成熟的境界,唐人楷书法度森严,结字匀称,笔意精到,章法和谐,骨肉相称,文质相谐,刚柔相济,为世人树立起“法”的典范,这种现象往往与其时代的审美观念和审美习俗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。

初唐楷书,承魏晋六朝之遗风,皆以劲健为尚,以瘦

硬为美,提倡一种内在的强劲骨力。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、薛稷被世人称为“初唐四家”,虞之圆润丰美,欧之方劲刻厉,褚之清腴端雅,薛之瘦练疏通,虽风格各异,但皆注重法度,点画精到细腻,结字端庄雅正,为后世楷法树立起历史的典范。

虞世南(558~638),字伯施,越州余姚(浙江省)人。虞世南书承智永,得二王法,其书端肃静穆,舒卷雅逸,用笔“圆浑温润而不露圭角”,“内含刚柔、立意沉粹”,“如白鹤翔云,人仰丹顶”。清吴德旋在《初月楼论书随笔》中曾对欧、虞两家书风进行了比较:“昔人评欧阳率更书如金剛怒目,大士挥拳;虞永兴能中更能,妙中更妙,二家之书,余实未敢定其优劣。涿鹿冯铨谓虞则内含刚柔,欧则外露筋骨,君子藏器,以虞为优,此言非也。欧亦刚柔内含,学欧而不得其笔,乃有露骨之病;学虞而不得其笔,又岂无肉重之失耶。”

《孔子庙堂碑》是虞世南的代表作,此碑书法锋芒内敛而气宇轩昂,字字珠圆玉润,体现了虞书含蓄生动的特点。在用笔上外柔内刚,笔力遒劲,气力沉厚,有千钧之力,点画之间,信手拈来,顺乎天然,通篇井然有序,其完好的整体效果令人赞叹不绝,这是书家注重精神内容的体现。清冯班《钝吟书要》云:“虞世南《庙堂碑》全是王法,最可师。”清刘熙载《艺概》云:“学永兴书,第一要识其筋骨胜肉,综昔人所以称《庙堂碑》者,是何精神!”

欧阳询(557~641),字信本,湖南临湘人。欧阳询博贯经史,经常与李世民切磋书艺,其学书笃志专精,书名远播。询初学王羲之,后又汲取了北朝峻拔淳朴书风而自创风格。欧阳询的楷书以险劲刻厉见长,法度严谨,清劲秀健,苏轼评其书谓:“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,尤工于小楷,率更貌寒寝,敏悟绝人,今观其书,劲险刻厉,正称其貌。”

《九成宫醴泉铭》是欧阳询的代表作,九成宫原名仁寿宫,隋文帝时建,在陕西麟游县西5里天台中,为唐

太宗避暑胜地,因乏水源,某日,太宗偶然发现“厥土微觉有润,因而以杖导之,有泉随而涌出”,其清若镜,味甘如醴,大喜,因敕命魏征撰文,欧阳询书碑,以记盛事。是碑立于唐贞观六年(632),因是奉敕所书,所以写得特别严谨,一笔不苟,点画工妙,沉静入骨,结字稼纤得度,意态精密。王澐《竹云题跋》评此碑曰:“率更风骨内柔,神明外朗,清和秀润,风韵绝人,自右军来未有骨秀神清如率更者,《醴泉》乃其奉诏所作,尤其是绝用意书。”

褚遂良(596~658),字登善,杭州钱塘人。褚遂良博涉文史,尤工楷书,贞观初,太宗出内府金帛征求二王遗墨,世人进献甚多,但其中真伪杂陈,褚为之鉴定,备论所出,一无舛误。褚遂良初学虞世南,后又上溯二王及汉隶,楷书自成家法,点画遒劲瘦铄,结字清远萧散,微杂隶意,古雅绝俗,有“美人婵娟,似不任乎罗琦”之态,言其用笔清雅婉逸也。《唐人书评》谓:“褚遂良书字里金生,行间玉润,法则温雅,美丽多方。”传世楷书作品亦各具风貌。

《雁塔圣教序》是褚遂良的代表作,唐永徽四年(653)立石。此碑用笔清腴温润、流丽婉畅,有行书笔意,是典型的褚楷风格,特别是其点画,看似柔,其实刚,貌似瘦,其实腴,正如王世贞谓:“评书者谓河南如瑶台婵娟,不胜罗琦,第状其美丽之态耳,不知其一钩一捺有千钧之力,虽外拓取姿,而中擫有法。”实为心得之言。

薛稷(649~712),字嗣通,蒲州汾阴(今山西万荣西)人。薛稷是太宗时宰相魏征的外甥,家藏虞世南、褚遂良真迹甚多,故锐意临摹,特别是对褚遂良的楷书尤为专笃,神形兼备,几可乱真,故时人有“买褚得薛,不失其节”之说,遂以书名天下。董道《广川书跋》评曰:“薛稷于书得欧、虞、褚、陆遗墨至备,故于法可据,然其师承血脉,则于褚为近,至于用笔纤瘦,结字疏通,又自别为一家。”

《信行禅师碑》是薛稷的代表作,唐神龙二年(706)立石。此碑用笔清婉瘦劲,结字萧散疏朗,与褚遂良《房玄龄碑》、《雁塔圣教序》酷似,但更为纤瘦凝练,虽仿自褚,而能独具风格,正如王铎所言:“《信行禅师碑》用笔浑融静逸,焕然古质,无后代习气。”张怀瓘《书断》亦评其书谓:“薛稷书学褚公,尤尚绮丽,媚好肤肉,得师之半矣,可谓河南之高足,甚为时所珍。”研究薛稷的楷书对上溯褚遂良楷法是有裨益的。

初唐书法之所以繁荣,除了历史因素之外,还与帝王的爱好和提倡有关,初唐书法在以上四家的影响下,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书家,他们亦能在楷书风格上稍出己意

而自立面目。

《道因法师碑》,唐龙朔三年(663)立石,欧阳通书。其书法出自家学,尽学父书,与其父欧阳询合称“大小欧阳”。欧阳通的楷书虽出于父,但却写得更瘦硬、更挺劲,特别是主笔横画在收笔时末锋飞起,富有十分浓重的隶意,这就成为他楷书的一大特色,这种锋棱的捺在书法术语中称为“批法”,刘熙载《书概》谓:“大小欧阳书,并出分隶,观兰台道因碑有批法,则显然隶笔矣。”正由于欧阳通善用仰势、背势和锋棱之势,故能给人一种神采奕奕的艺术感受,明王世贞评其书曰:“《道因碑》如病维摩,高格贫士,虽不饶乐,而眉宇间有风霜之气,可重也。”但锋芒棱角太露既促成了他的书法特色,也成为历代评论家的众矢之的,杨士奇批评他的字“少含蓄之趣”,《书断》评其书“瘦怯于父”,这与当时以“君子藏器”的审美观念有关。

《卫景武公碑》,唐显庆三年(658)立石,王知敬书。通观此碑,点画清峻遒美,有六朝碑版遗意,锋棱耀其精神,结字端庄茂密,参差错落,自然生动,虽不及欧楷之严谨,却蕴涵褚字之风韵,很明显,此碑结合了欧、褚的长处而自成一格,杨守敬《平碑记》评曰:“王知敬之《卫景武公碑》气质稍小,然精劲而毫无懈怠。”赵崡亦谓:“余观此碑遒美,直是欧阳率更、虞永兴之匹敌也。”

《王洪范碑》,唐乾封二年(667)立石,王玄宗书。从碑字来看,汲取了欧阳询《化度寺碑》和褚遂良《孟法师碑》的特色,点画方劲清峻,结字平中寓奇,又兼有六朝墓志之遗风,写得姿态跌宕,意趣十足。蔡世松跋云:“此碑法兼欧、褚,又骀骀乎方驾隐居矣。”

《孔祭酒碑》,唐贞观二十二年(648)立石,无名氏书。从此碑书写者的楷法来看,极似虞世南之《孔子庙堂碑》,据宋代黄伯思《东观馀论》云:“验其笔法,乃当时善书者规摹世南之书而为之者也,笔势遒媚,亦自可珍。”细观此碑,用笔圆润,体势端庄,十分接近虞世南之风格,但时挟方笔棱角,结字亦较《孔子庙堂碑》瘦长疏朗,可知作者虽学虞而能自出己意。通篇观之,点画清腴圆润,用笔沉着遒劲,结字平而不板、正而不拘,显得神采奕奕,气息清婉,不失为唐碑中之精品。

南北朝书法经隋代的交汇融合,为唐代楷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初唐楷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,推动了楷书在唐代走向鼎盛时期,其建立的楷法为世人树立了典范,千百年来,众多的书家无不取法唐人,然后分化出众多的风格与流派。